

“欧洲共产主义” 与国家

〔西班牙〕圣地亚哥·卡里略著

商 务 印 书 馆

“欧洲共产主义” 与 国 家

〔西班牙〕 圣地亚哥·卡里略著

钟 琦 译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商 务 印 书 馆

1978年·北京

Santiago Carrillo
“EUROCOMUNISMO” Y ESTADO
Editorial Critica
Barcelona
1977

内部发行

“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

〔西班牙〕圣地亚哥·卡里略著

钟琦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2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 8印张 117千字

1978年1月第1版 1978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3017·219 定价：0.76元

译 者 的 话

今年4月，西班牙共产党(修)总书记卡里略发表了他的新著《“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后，苏修《新时代》周刊曾猛烈攻击，并引起西欧修党和欧美资产阶级报刊的强烈反响。为了了解“欧洲共产主义”的内容和实质，现将卡里略的《“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一书译出。

作者卡里略生于1915年，1936年加入西共。1937年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42年升为政治局委员。他曾任马德里保卫委员会委员，希拉尔流亡政府部长。1960年当选为总书记。他长期流亡国外，1976年2月秘密回国。1977年4月，在西班牙四十年来第一次全国选举前夕，卡里略赶写了这本书。

全书分前言和六个部分。作者在书中阐述了西班牙这一类型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即“欧洲共产主义”。但是，作者所说的社会主义道路，既不搞无产阶级革命，也不要无

产阶级专政，让资本主义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这种观点、主张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赫鲁晓夫、陶里亚蒂、多列士等新老修正主义分子一贯鼓吹的“和平过渡”和“议会道路”的继续和发展。但“欧洲共产主义”也反映了西欧修党要求联合起来，独立自主，摆脱苏修控制的倾向。这是值得注意和研究的。

本书按原著版本体例编排。书中的引语，除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引语已按中文本核对外，其他人的引语未加核对。由于时间仓促，译文质量不高，难免有疏误之处，仅供内部参考，对外请勿引用。

1977年9月

目 录

	前言·····	1
一	国家对社会的作用·····	7
二	国家意识形态工具·····	31
三	国家强制工具·····	65
四	民主社会主义的模式·····	108
五	“欧洲共产主义”的历史根源·····	157
六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	203

前 言

由于情况特殊，我比较有空，而且也有兴致，于是我便对共产党人面临的一个最复杂最困难的、任何探索都有点冒险的问题进行了研究。

1976年2月，我跨进西班牙国境时，就知当局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不会允许我在国内露面，迫使我继续过一种完全处于地下的生活。我打算一方面积极和同志们一起商定各项政治决策，为出现一个适应民主制度的共产党而进行工作，另一方面逐步打破处于地下的状况，争取我作为西班牙公民的权利。尽管如此，我知道，我不得不采取的活动方式会使我有时间来进一步研究一个时期以来我不断在思考的问题，并把这些想法写下来。

一位朋友乐于向我提供使用其藏书的方便。他的藏书种类繁多，数量众多。尽管在西班牙书刊检查制度的限制下，我想引用和注明出处以及核实记忆而需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并不齐全，但我

最关心的论证国家问题的书籍还是很多。一部分书用处不大，而另一些却很有用。倘使我能自由活动，引用的材料定能更加可靠，我也能从中得到更多的帮助，不过一旦能自由活动，我便难以有时间做这件工作了。反正总得有所取舍。

1919年7月11日，列宁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作题为《论国家》的报告时，告诉听众，如果认为报告不够明确，说服力不充分，也不必懊丧，“因为国家问题是一个最复杂最困难的问题，可以说，也是一个被资产阶级的学者、作家和哲学家弄得最混乱的问题。”①

作为才学浅薄的自修者，我想对此作一点小小的补充。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本身也有含糊不清的地方，甚至有时还有矛盾（至少是形式上的矛盾），这就可能在读者中产生疑问，至少是引起思索。这个课题已被搞得如此之乱！如果从理论去看实践，那末，矛盾和混乱还更严重。因为列宁在关于这一课题的经典著作中所描述的过渡性的社会主义国家，同列宁在世时在实际中出现并得到发展的国家（更不必说他死后的那种国家）之间，

① 列宁：《论国家》，《列宁选集》第4卷，第41页。

* 着重点系卡里略所加。——译者

有着种种根本的区别。

我在本书中经常使用“欧洲共产主义”这个提法，读者也许感到奇怪。这一提法现在十分流行，尽管尚未得到共产党人的正式承认，且其科学价值也还是值得怀疑。但在舆论中，它已经有了一种含义，并且一般说来，成了目前各种共产主义倾向之一。这种思潮到目前为止，与其说表现为一种理论主张，不如说表现为对政策进行严肃的自我批评。所以如果它还有些不确切，那末，这种不确切性至少部分地是由于探索得还不具体而造成的。这一情况再次表明，实践通常领先于理论，而理论又是实践的概括。当然在理论指导实践，给予科学的活力，并广泛地阐明其作用的情况下，实践也就会具有可靠的依据和根本的内容。

然而，“欧洲共产主义”所依据的政策和理论主张，确定了当代进步革命运动的一种倾向。这种倾向力图切合本大陆的实际情况（虽然在根本上对所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有效），力图使得具有当代特点的世界革命进程的发展符合欧洲的实际情况。

世界共产主义工人运动中公开明显地存在的实际问题和矛盾，是形成上述进程各种问题和矛

盾的反映。其中显然包括有关国家的矛盾，这些矛盾是有些地方在以前的社会结构下采取种种特有的途径建立政权而造成的，其中强行并吞起了不小的作用。这种被造成的政治状况，不是总能符合当地种族和历史状况的；凌驾于这些矛盾之上的，还有新的矛盾，即由于在这些或那些问题上利害不同以及由于列宁早就说过的无产阶级并不会因夺取了政权就变成圣人而出现的矛盾。然而，共产主义工人运动中的问题和矛盾也渊源于各种道路、具体情况、文化传统影响、经济社会结构等方面的不同，这些不同造成了实际存在多种政治思想倾向的状况。当革命进程带着巨大的差异扩展到全世界，这些不同也就表现得更为完整。

存在不同的倾向是今天的现实。用“实行统一的命令”也好，用革出教门也好，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在社会、文化、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世界化的漫长过程（谁也无法预言需要多少时间）中，逐步消除这些倾向。

我们至今还没有找到更好的说法，这就是在确认现实的情况下人们所说的“欧洲共产主义”。应该指出，这一倾向固然有其不可否认的特点，并曾在 1976 年 6 月在柏林举行的国际会议上有所

表示；但它既不是一个组织，也未曾制订任何的共同纲领。

这并不是要宣传一种第三条道路。如果把世界革命进程采取的各种不同的道路都罗列出来，则人们所知道的就远远不止三种。

这也不是向社会民主党立场的倒退，也不是否定必须产生各国共产党的历史原因。

必须承认，本书对国家问题的看法不同于列宁在 1917 年和 1918 年的论点。列宁的论点适用于俄国，理论上也适用于当时的其他各国，然而今天已经被超越，已经不适用于西欧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不能适用，是因为经济结构起了变化，客观上壮大了进步的社会力量，包括核能力在内的生产力有了发展，社会主义和非殖民化取得了进展，法西斯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了失败。

有的人读到列宁的某些论点已被超越之时，也许觉得这是亵渎。这种人不知道列宁对马克思也讲过同样的话，而且苏联的列宁的继承者也曾公开修正列宁的某些论点。

我于 1976 年 12 月 22 日在马德里被捕，中断了关于这个问题的写作。一星期后我获释出狱，

成了合法的公民，于是从那时起就再也没有时间进一步修改我的写作，只在付印前粗糙地审阅了一遍。我相信书中的缺陷和不足，将在今后对这一如此重要和决定性的课题的辩论中得到克服。

一 国家对社会的作用

国家政权的问题继续
是一切革命的问题

开始下笔，我就想立即概要地阐明这个我要提出的棘手问题，仅仅是为了引起辩论，促使更加高明的有识之士继续这一工作，即使我完全被压倒也心甘情愿。这里谈到的是西班牙共产党在具体论及前途方面提出的（意大利、日本、法国、英国、瑞典等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也大体类似地提出的）关于国家、民主和社会主义的课题。这些党并不企图充当榜样，目前正在按照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特点，在国际共产主义工人运动中制订一条革新的路线。

关于这一路线，某些信仰相同的人以及许多观点敌对的人，都写了严厉批评的文章。信仰相同的人谴责我们是机会主义，为了“民族主义”而放弃了国际主义，是“反苏主义”，抛弃“阶级立

场”。总之，说我们是修正主义，象谈论“恐怖主义者”一样地把我们说成是某种概念不清的东西。

读者在回忆中，也许不曾忘记东方国家的领导人和官员大量散布谴责我们的文章和讲话。

而我们的政治对手，甚至是某些盟友却从另一个角度攻击我们，或对我们有所保留。他们表示，这可能仅是一种“权宜之计”，在某些情况下是为了便于取得其他民主力量的谅解，走出处于地下的小圈子，或者也是为了获得更好的选举结果，其最终目的是为更方便地上台执政打开道路，等到一旦执政，我们强大了，就会“摘去假面具，采取强硬手段”。

我在这里不过对上述两种人的批评作一简单综述，各种批评常有极其细微的区别，但是其根本意思就是这样。

这种批评是完全错误的，而且无数的批评存心不良，自欺欺人。但是，我并不低估这种批评不仅在某些工人和人民群众以及在自由职业者和知识分子即在中等阶层里，甚至还在我们自己党内所造成的影响。在我们党内，可能有人认为我们若非已经陷入的话，也正处于修正马克思主义的边缘而危及我们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观念。有些同

志也可能相反地认为，我们的方针实际上是用圣像和施舍造反的一种特定时期的权术，认为这是世界上最理所当然的态度。

纵然在西班牙这样一个刚刚痛苦而茫然地摆脱了四十年独裁统治的国家里，各个政党（不包括我们党）在运用政策方面采取了一切能在策略上有利于自己兴旺强固的手段，不必过多地顾及原则。对于这些党，人们无论如何都能原谅的。它们可以采取这些对它们有效的方法，因为人们相信，即使这些政党取胜，它们也是不会改变社会制度的。与此相反，共产党人却处于众目睽睽之下，我们得不到那样的容忍。人所共知，我们是要改变社会制度的，我们并不对此故弄玄虚。许多人害怕我们也将不可逆转地破坏种种政治权利，并取消在野派的权利，因为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在取得胜利之后确实是这样做的。

为了实现我们所主张的道路（政治上的民主权利和人权是人类进步中无法否认的历史成果，我们争取的社会主义将要在经济上和社会上赋予新的内容，保持和丰富这些权利），为了实现这一理想，仅仅抛开我们的理论家创造的某些公式（比如无产阶级专政的公式），仅仅声称我们遵守民主

制度是不够的。还必须对今天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处的世界形势，对生产资料取得进步所造成的后果以及由其推动的新的社会结构，进行贯通全局的分析，尤其要对目前的国家，特别是通过民主道路改造国家的可能性进行研究，也要批判地加深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认识。

如果我们拿不出站得住脚的观点，来证明有可能使资本主义国家机器民主化，并把它改造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有效工具而不必采用暴力从根本上加以摧毁，那末有人就会说我们是策略主义，或者把我们比作社会民主党。

因为国家机器就其整体来说，仍然是统治阶级的工具，而且是一种精心使用的工具。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国家并不凌驾于各阶级之上，不是各阶级的仲裁人。然而有一种思想却竭力持与此相反的论点，以不同说法表达的这种思想起码可以追溯到黑格尔，而由法西斯主义把它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不改造国家机器，整个社会主义改造就搞不好，甚至白搞。尊重选举结果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这却不是选举结果的问题。问题在于会受到在理论上保卫法制的那些人的有力的打击。

智利的经验表明，在准备尝试社会主义的人民团结政权之下，国家机器仍然是一个受到美帝国主义及其各种机构和多国公司深刻渗透的资本家的统治工具。这部机器却反其道而行之，一当形势有利，就取消了民主宪法，建立了残暴的军事独裁统治。

资本主义国家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这种国家当前有些什么特点？如何加以改造呢？这就是一切革命的问题之所在，也是我们准备通过民主、多党制、议会这种道路实行的那种革命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不能够无视的。

对于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关系，对于很有名望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按我的愚见，他们是草率和匆忙提出的）民主概念，也必须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从这个高度重新思考社会主义的概念也是值得的。通过某种方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社会，现在已有好几种例子。尤其是当今这个时代，连宗教神话都发生了危机，因而我们不能神化这些社会，而要研究它们的经验，以便摆脱我们的导师们在论述这个问题时多少带着一些预卜空想的那种状态。他们那时没有掌握现在的经验，因而无